



JINDAI ZHONGGUO
KONGXIANG SHEHUIZHUYI
SHILUN

近代中国空想 社会主义史论

刘其发 主编

華 夏 出 版 社

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史论

刘其发 主编



华 夏 出 版 社

1986年·北京

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史论

刘其发 主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劲松中街208楼

湖北省长阳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223千字

1986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书号3484·002 定价1.50元

目 录

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简论·····	刘其发 (1)
论洪秀全的平等思想与社会主义乌托邦·····	刘其发 (17)
戊戌时期的“大同”思潮·····	裴大新 (30)
关于康有为“大同思想”的评价问题 ——与汤志钧同志商榷·····	张家骧 刘其发 (84)
梁启超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几个问题·····	杨汉鹰 (118)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西方社会主义的输入与 中国传统的“均平”思想·····	杨汉鹰 (132)
评孙中山的社会主义·····	刘其发 (187)
马克思主义对朱执信的影响与朱执信的 社会革命思想·····	张家骧 (197)
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述评·····	汤庭芬 (215)
评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	汤庭芬 (228)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及其分化·····	汤庭芬 (241)
试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破产·····	汤庭芬 (255)
后记·····	(285)

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简论

刘其发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中国一切优秀革命传统的继承者，也是近代中国一切优秀文化思想的继承者。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武器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前史，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由空想到科学的演变道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产生过何种积极的与消极的影响。这些问题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尚未作过系统的考察，而且存在着很多分歧。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中国人民领会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有现实意义。

列宁指出：“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①近代中国文化思想也具有这两种成分和传统。随着中国的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为这两种

^①《列宁全集》第20卷，6页。

运动的先导和伴侣，出现过三个阶级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之前，中国出现过四种形态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即农业社会主义、大同主义、民生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取得统治地位的年代，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在科学社会主义旗帜下，不断摆脱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走上独立的政治斗争的大道。资产阶级的丧钟已经敲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空想与试验，已经被历史所抛弃。标志这一历史巨变的是《共产党宣言》公布于世，1848年六月巴黎无产者的起义，1871年巴黎公社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而此时的亚洲和中国，却还沉睡在封建的闭关锁国之中。鸦片战争把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体系，卷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其结果是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人民陷入双重的压迫与剥削的痛苦之中。激烈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导致连绵不断的起义，汇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反对外国侵略与清王朝的农民革命的滚滚洪流——太平天国运动。当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刚刚镇压了无产阶级的起义，资产阶级正在凯歌行进之时，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不只是中国人民觉醒的曙光，亚洲觉醒的曙光，而且是对欧洲资产阶级的当头棒喝，对欧洲无产者与社会主义斗争的声援。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①。”太平天国革命不只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序幕，而且同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历史地联结起来，它在自身的实践与理论中揭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页。

想，马克思称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①。

《天朝田亩制度》是体现太平天国农民民主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的主要文献，它是洪秀全早期三篇《原道》提出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平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太平天国三年战时共产主义实践的总结，是洪秀全建立人间天国的蓝图，其基本内容是：

（1）“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它要消灭一切私有制，不仅要求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公有，生活资料也要公有；

（2）平均主义地分配土地与生活资料；

（3）社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实行农业与手工业结合。

总之，它幻想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用平均分配财产与产品的办法，消灭一切剥削与压迫，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堂。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经济的变化，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传入，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性的维新运动。这个维新运动的政治纲领是君主立宪，经济纲领是发展资本主义，而它的思想武器则是西方的民主思想与中国的大同主义。1884年康有为开始著《人类公理》，其基调是《礼运·大同》所描写的理想国。王韬、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人，以不同形式，不同音调，唱着一曲“大同”之歌。他们开学堂，办书社，兴学堂。在宣传新政的同时，高举着一面“大同”旗帜，作为鼓舞当前斗志与奔向未来的精神支柱。直到1902年，康有为才完成了《大同书》，非常详尽地构造了未来的大同盛世：

（1）大同社会消灭私有，实行财产公有；

（2）大同社会是物资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

（3）大同社会人人平等，人人劳动，没有压迫与剥削；

（4）大同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国家。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265页。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革命民主主义的伟大先驱，也是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理论形式是民生主义，其基本内容是“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孙中山多次讲，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①。”列宁则称之为主观社会主义。

与孙中山主观社会主义大致同时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有以《天义报》和《新世纪》为代表的早期无政府主义，到五四前夕更加泛滥起来。它是以社会主义面目出现的，被许多先进人物视为新思潮而风靡一时。无政府主义虽然有多种流派，但其共同的政治思想内容是：

(1) 废除财产私有，一切生产资料（土地、工厂等）归社会公有；

(2) 人人劳动，无有阶级；劳动成果，人人皆得自由取用；

(3) 立即消灭一切政府、军队、警察、监狱。

从以上简要叙述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有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并且在思想内容与理论形式上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

(1)、它总是同爱国主义相结合。先进的思想家的出发点与目的，是反对外国压迫，争取国家独立富强，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空想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康有为的《人类公理》是“感国难”之作，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也是始于不堪于列强的侵略^②。西方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同一过程，那里没有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

(2)、它总是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相结合，相伴而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补充，不像西欧国家的空想社会主义，总是同资产阶级的民主相对立，作为劳动者把平等要求引伸到社会

^①《孙中山选集》下卷，765页。

^②参见康有为《自编年谱》与孙中山《我的回忆》。

经济领域的独立表现。

(3) 它吸收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并使之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康有为、孙中山乃至无政府主义都以大同思想附会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又赋予大同思想以近代的思想内容。

近代中国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存在分歧的。有的同志否认太平天国是社会主义乌托邦；有的同志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化，连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都没有；有的同志不把无政府主义算作社会主义之列，等等。否认近代中国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所持的理由是：空想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只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才能算社会主义思想。太平天国时期，只有资本主义萌芽，康有为、孙中山时期，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只有初步发展，不可能产生欧洲那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及其在历史上的运用。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一种意见认为是剥削阶级存在而产生的反抗剥削者的意识形态。由于产生的前提不同，因而对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也就不同，前者认为批判、改造以至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才是社会主义，后者认为只要是批判、改造以至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思想，都可算作社会主义。我们采取了后一种观点。我们认为：(一) 作为反抗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共同特征；(二)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恰恰是在中国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资本主义刚刚发生的时期，就产生了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往往把反对私有制，主张财产公有的思想，当作社会主义。我们不是把原始公社称为原始社会主义吗？有学者也把社会主义分为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可见社会主义概念在历史上的运用，

并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形态；（四）、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反对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不仅是一切社会历史形态空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而且是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点。《共产党宣言》有句名言：“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问题是空想社会主义不可能了解消灭私有制的物质条件、正确道路与依靠的社会力量。

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光辉篇章，我们应给予科学的总结，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二

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运动，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代替农民的民主运动，无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与此相联的中国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也是一个前进的发展过程。

如同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较之农民革命运动前进一步一样，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社会主义空想较之农业社会主义前进了一步：

（一）它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虚构未来，摆脱了自然经济的狭隘眼界，是向前看的，而不是把历史拉向后退。

（二）它对旧制度的批判与对新社会的幻想，建立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神秘的力量之上，是在温和的政治舞台，而不是在宗教的祭坛。

（三）它不再用粗卑的禁欲主义与平均主义去激励人心，而是用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幸福追求诱人神往。

从小生产到大生产，从神性到人性，从禁欲主义的苦修苦练到追求人的自由与幸福生活，是近代中国人民思想的一大解放。

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继承了太平天国的平均思想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但它不仅与洪秀全的农业社会主义不同，而且与康

有为的大同主义空想也不同。

（一）孙中山与洪秀全的共同之处是抓住了土地问题这个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虽然他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流于温和与烦琐，但他摒弃了洪秀全的绝对平均主义。康有为则忽视了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在《大同书》中挂上了一块公农的招牌，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在土地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上，孙中山较之洪秀全与康有为都前进了一步。

（二）洪秀全的乌托邦是从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推演出世俗的平等，由此虚构人间天国。康有为是从天赋人权、资产阶级人性论以及进化论推演出大同世界。虽然，从神性到人性是一个进步，但都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论。孙中山的民生史观虽然从整体上是唯心的，但却带有唯物的成分，他抓住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与中国经济和政治中的主要问题，即土地、资本与民主问题，虽然他的观察与分析有表面性、片面性，但他毕竟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社会灾难，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与残缺不全。孙中山没有康有为那样沉陷于想象，而是注重于探讨社会主义的途径与政策。孙中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论从深度与广度上，较之康有为都大大前进了。

（三）洪秀全是靠上帝的神秘力量实现人间天国，康有为是靠皇帝的力量为大同世界开拓道路，他们都是从上面给受难的大众施舍阳光和雨露。洪秀全是上帝差遣到人间的救世主，康有为自命是普渡众生的圣人。孙中山虽有先知先觉之论，看不起群众，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但他不象康有为那样出于对劳动者的“怜悯”，而是对劳动者的真正同情。他抛弃了宗教色彩与封建色彩，循着公开的政治斗争的大道，一往直前，不屈不挠。他既不象洪秀全那样向封建主义蜕化，也不象康有为那样由保守走向反动，他从维新进到革命，又从旧民主主义进到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行列。

(四)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传统的均平思想对三人的影响则有所不同，洪秀全继承的是劳动人民的均平思想，康有为继承的则是统治阶级的均平思想，孙中山兼而有之，而主要的是劳动人民的均平思想。他们都向西方学习，但吸取的思想养料各不相同，洪秀全学习西方的基督教，康有为主要学了西方的君主立宪，孙中山吸取民主共和国思想与社会民主主义。这就表明他们赋予中国传统思想以近代内容，和学习西方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有同志认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是对辛亥革命的一种反动，是一股思想逆流。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无政府主义在欧洲确实变成了反动思潮而早已破产了。列宁对此有过评述^①。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却被当作救世良方广为传播，其根本原因就是在那时的中国，出现了大量破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无政府主义这种“绝望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中国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遇到了知音。它同以上三种空想社会主义一样，要求消灭剥削，但不懂剥削的根源；空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懂得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他们痛恨国家，不懂得无产阶级的国家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无政府主义从总体讲是反科学的，但他们的矛头是对准清王朝与帝国主义的，他们同革命民主派可以建立暂时的同盟，他们的理论与革命狂热，被因多次失败而绝望与沮丧的知识分子当作黑暗中摸索的一线曙光。无政府主义较之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的社会主义空想，在以下三个方面则前进了一步。

(一) 无政府主义的纲领较多地反映了劳动者的愿望，这从当时许多文献可以看出来。他们明确提出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资本家的私有制与地主土地私有制，并且提出了依靠“劳民”

^① 《列宁选集》第1卷，219页。

(农民与工人)革命的主张。这两点不仅比康有为的大同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比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更为激进。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没有根本否定地主与资本家的私有制，而以调和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矛盾的方法，使私有制消灭于共同繁荣之中。无政府主义的实践纲领，更能唤起劳动者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响应。

(二) 最早介绍西方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接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把社会主义宣传转向工人运动的却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进行了种种试验，最早投身到工人中去，组织工会，组织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虽然经济斗争只能产生工联主义，但它毕竟是启发工人觉悟的一种斗争形式。

(三) 中国早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不少人经过了无政府主义的迷茫时期，包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包括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等一大批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桥梁。

从以上简要叙述，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各种形态之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其中有继承与发展，从总体上说，是向前发展的。

三

近代中国历史提出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在每次大的民主运动中，出总是现与民主思想相伴而行的社会主义空想。恩格斯曾对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作过评述：“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

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①。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空想是民主主义的补充与发展前景，不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多少独立的理论表现，而是资产阶级领袖人物所倡导。为什么在民主运动中总是提出社会主义的前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能够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只能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提出的任务，推动历史前进。但是，人类的认识史表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历史被唯心史观笼罩着，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得不到科学的解释，进行着种种虚构。一切空想家都是如此。然而，这种虚构也不是从天而降或者头脑里固有的，总是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近代中国民主运动中产生社会主义空想，是同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条件紧密相联的。

近代中国是近代世界的一个部分，世界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制约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诸方面，无不受其影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是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发生剧变的时代。列宁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②具体说来，有两个历史变化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只有初步发展。这一基本事实表明，世界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世界已被瓜分完毕，殖民统治加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不能不受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国走独立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06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448页。

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已被堵死。

(二) 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无产阶级广泛地组织起来，为准备夺取政权而斗争，并且出现了巴黎公社夺取政权的伟大创举，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才刚刚兴起。这一基本事实表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压迫之下走不通，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历史规定了中国不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但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并不因此窒息，他们手中只有从西方学来的民主主义，他们的力量与思想武器显得陈旧与软弱。上述那两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迫使他们不能不考虑如下的问题：能否在资本主义现代大生产条件下，消除由此而来的社会弊端，能否不经过流血搏斗而达到理想之境，或者使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如此等等。在洪秀全时代，上述的世界变动尚不存在，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农民阶级本能的表现。康有为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空想，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矛盾充分暴露而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产物，又是中国的民主运动日益兴起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结合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在民主运动中提出社会主义空想，除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影响以外，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发达也有直接关系，因为，（一）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还隐蔽在新的经济关系之中，民族资产阶级还看不到自身潜伏着的经济与政治矛盾，这就可能使这些代表人物产生共同繁荣的思想。康有为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空想的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在他们的学说与改革之中贯穿着阶级调和思想。康有为把穷人与富人之苦并列，他的分配方案把资本家与工人列为同等的劳动者。孙中山说他的平均地权，是既有利于农民又使地主不吃亏。（二）民族资产

阶级与工人有着共同的敌人，在面临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压迫的斗争中有共同利益，这就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能够以全民族代表的面目出现于政治舞台，特别是有些代表人物本身并非资本家，如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同资产阶级还有区别，这就使他們幻想一定阶级解放的特殊条件，也就是使整个社会得到挽救的一般条件，不同阶级的利益都可得到实现。他们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不是首先解放某个阶级，而是幻想立即解放全人类。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派，俄国的民粹派，都是如此。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尚不发展的时期，而且受着双重压迫，中国的先进思想家们具有共同繁荣的思想，企图用他们的社会主义空想使中国独立富强，同情劳动者，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希望中国乃至全人类都达到没有压迫与剥削的盛世，也就不奇怪了。

历史已提出了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中国先进的政治家们已经多少意识到社会主义将成为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①。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时期出现的社会主义空想，正是探索中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先声，那些空想家正是探索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先驱呢？

四

如何评价近代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除了因产生的前提不同而出现的分歧，还有一个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的问题，是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还是套用欧洲或者俄国的框框。有些论者认为《天朝

^①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都有这种论述。

田亩制度》一公布就是反动的，康有为的《大同书》是麻痹群众民主主义意识，无政府主义思潮是一股反动逆流等等。这些观点显然是套用欧洲或俄国框框的表现。（一）在欧洲或俄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反动的，因为在欧洲资本主义取得了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科学社会主义逐步在工人运动中占了统治地位，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企图恢复中世纪的农业与手工业，在政治实践上，他们或者动摇或者站在反动势力一边，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二）在欧洲，无政府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第一国际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巴枯宁到处制造分裂，破坏工人运动的团结，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破产了。（三）在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归为保守一类^①。在俄国，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一文中指出：“自由派的乌托邦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乌托邦腐蚀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②。因为俄国的资产阶级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已经充分暴露了它的反动性，俄国的革命已经有以科学社会主义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九十年代的民粹派已经变成了富农的代表。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它各国的具体特点。”^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同当时欧洲或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有不同的特点。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时，革命的力量主要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前，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0页。

②《列宁选集》第2卷，431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512页。